

贈閱

广西桂平县 都合乡石纹调查报告

内部参考



35
广西僮族自治区民族研究所編

一九六四年八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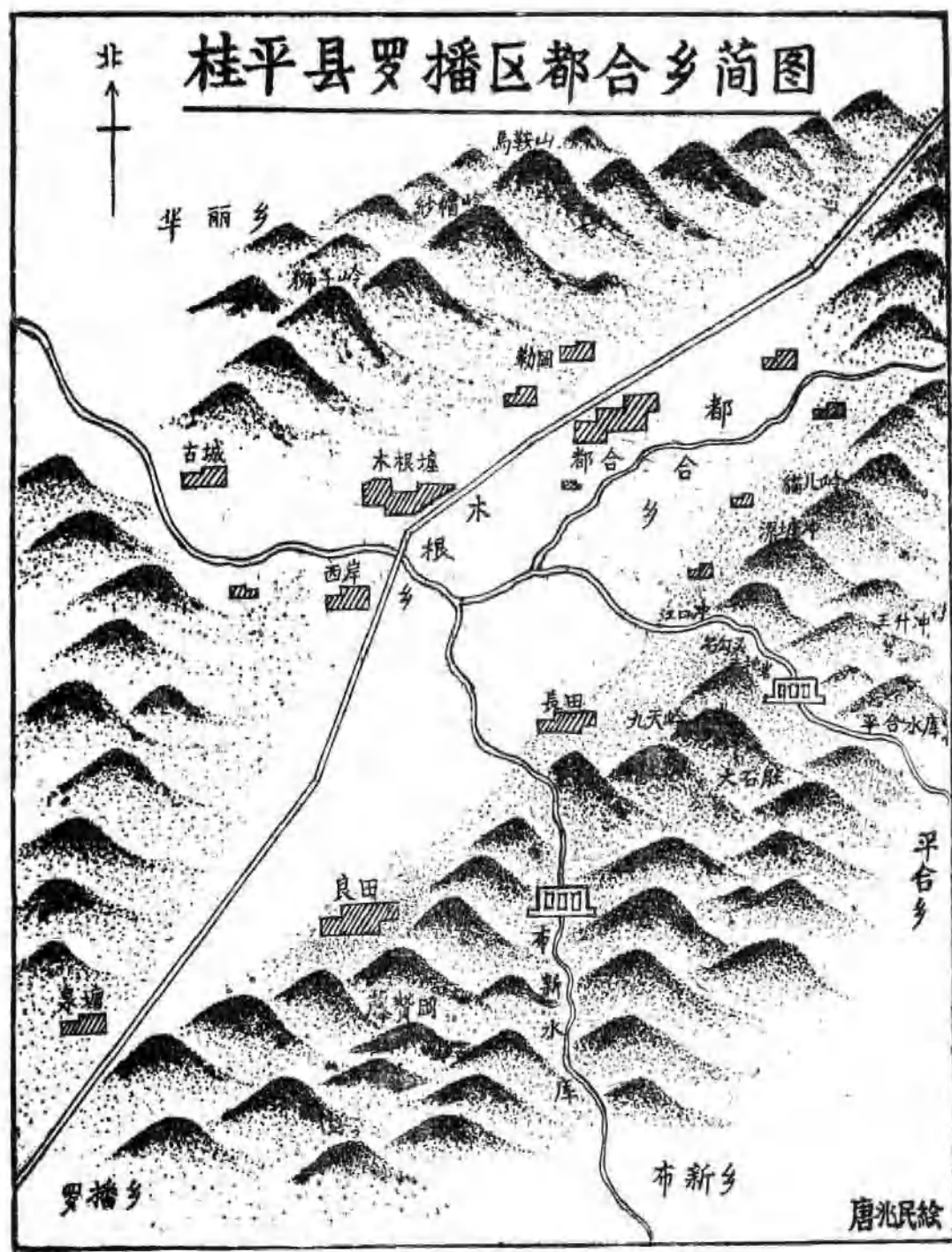
編 印 說 明

《广西桂平县都合乡石纹调查报告》，是根据我所于一九六四年四、六月間先后两次组织有关单位的历史、考古、地质、美术等工作人员，前往都合乡观察、调查时所收集的材料以及座谈会上各人发表的初步意见编写而成，为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资料。

至于各人对这些石纹的看法，总括起来，大致有如下的三种意见：有人认为是自然形成的；有人认为出于人工鐫刻；有人认为两者兼而有之。它究竟出于人工鐫刻或由于风化而成，如属前者，它又表达什么意义，我们由于水平所限，目前尚不敢貿然作出判断。敬希专家学者們多予指教！

編 者 1964年8月

桂平县罗播区都合乡简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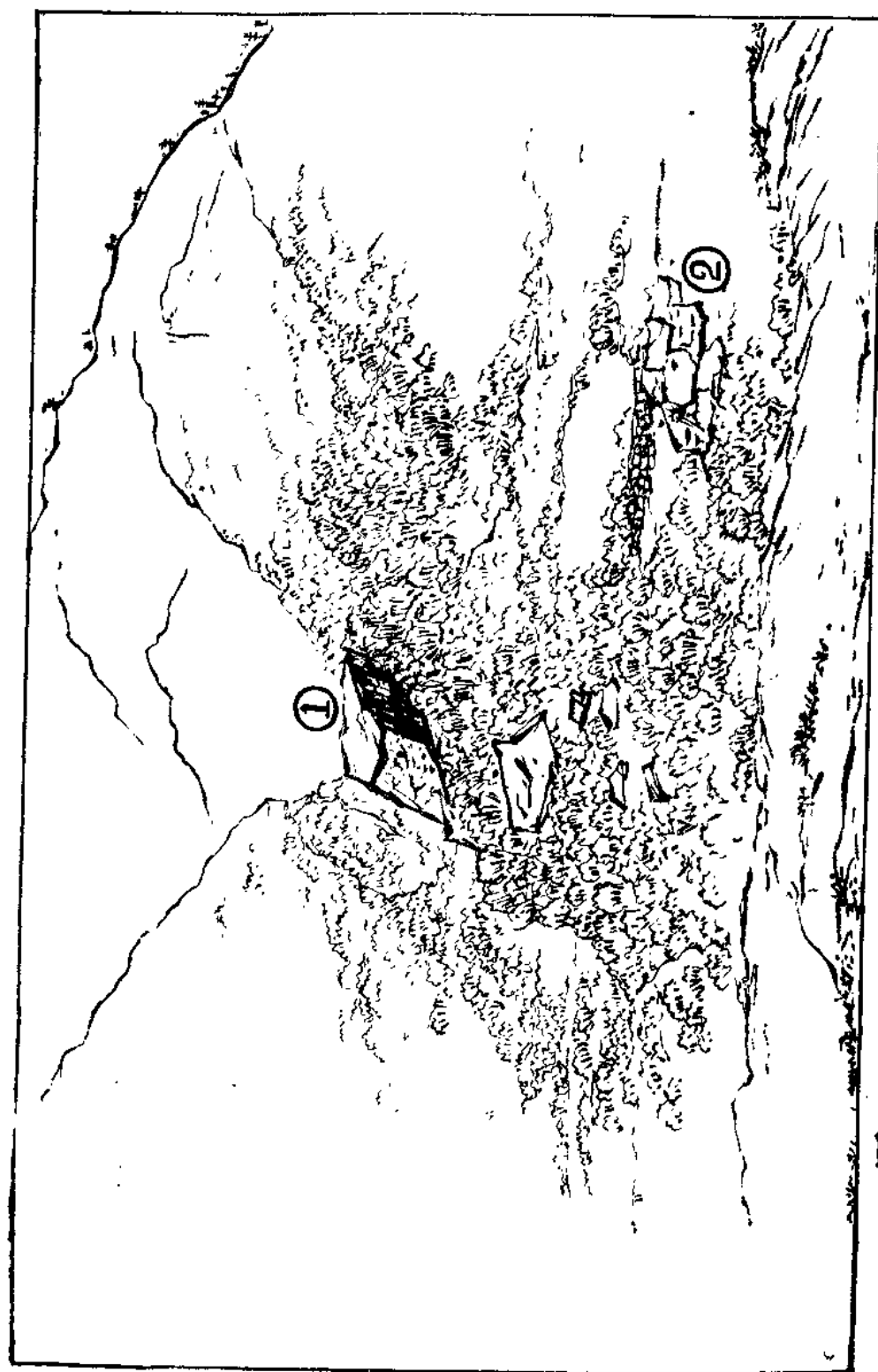
石紋照片



王升冲阴纹石之一(部分)白先经摄



深塘冲阳纹石之二 白先经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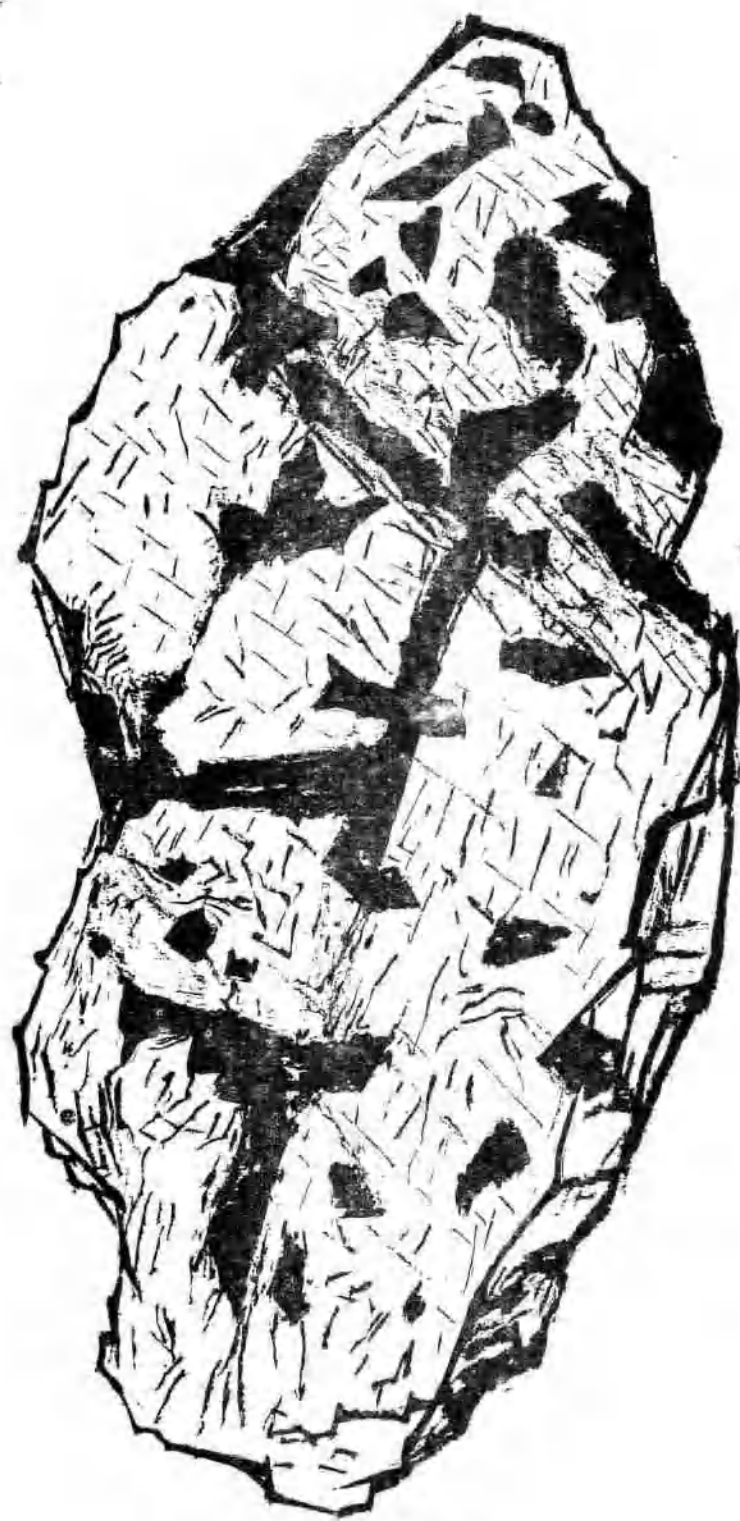


图I 王升冲阴纹石位置图 梁汉昌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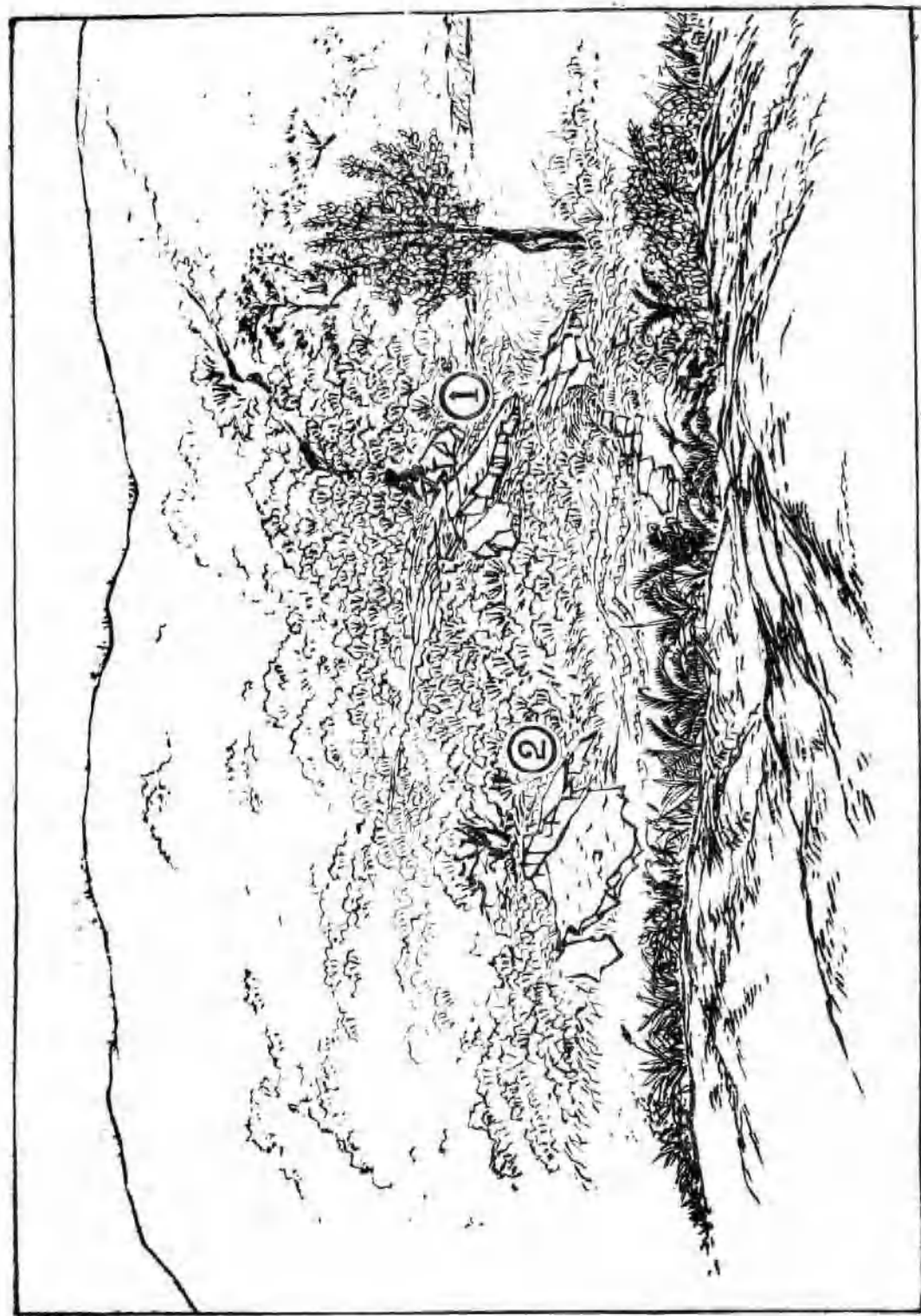
图II

王升冲阴纹石图样之一 唐兆民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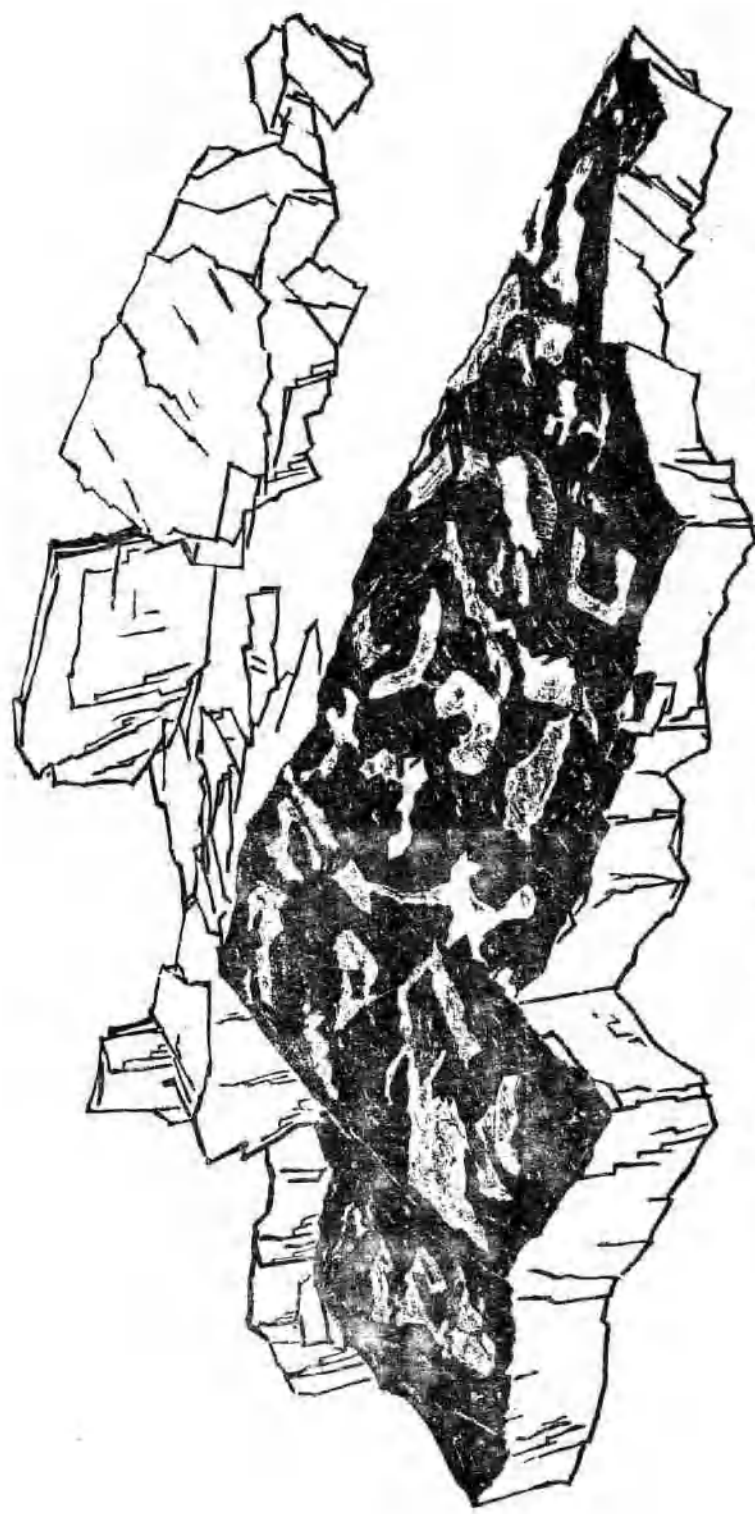


图Ⅲ

王昇冲阴纹石图样之二 梁汉昌绘



图IV 深塘冲阳纹石位置图 梁汉昌绘



图V 深塘冲阳纹石图样之一 梁汉昌绘



图VI

梁汉昌绘 深塘冲阳纹石图样之二

桂平县都合石紋调查报告

为了了解桂平县都合石紋的实际情况，以便作进一步研究，我所特地組織了有关单位的一些同志，先后两次前往桂平县进行实地观察、調查，收集了有关資料。

第一次前往观察、調查的共九人：广西民族研究所張景宁、曾誠、白先經、韦振輝、李干芬、唐兆民，广西民族学院范宏貴、沈端发，区政协李靜生等同志，于1964年四月二十日由南宁出发往桂平。到县后，桂平县人委并派办公室副主任楊毓芝、县文化館副館长陈敬煌，二初中校长姚之楷、罗播区副区长廖子丰等同志协助工作。

由于時間短促，因而我們整个調查參觀日程的安排是十分緊湊的。二十日到桂平；廿一日到县城各有关单位联系；廿二日上午乘汽車往罗播区都合乡，下午开始了解当地的地理环境情况及調查訪問了一些有关石紋的傳說；二十三日上午到深塘冲寻获了两处阳紋岩石，下午到王升冲（又名灯芯冲或狗儿冲），实地考察徐松石在所著《粵江流域人民史》中記載的“都合文化”——阴紋石刻；廿四日轉回县城。此次考察，我們是采取实地观察与調查訪問相結合的方法进行工作的，既观察实地的具体情况，又訪問民間的口头傳說，还选拓了一些石紋及拍摄一些有关照片，以期占有比較丰富的材料，作为今后研究的依据。

都合乡在桂平县南，离城四十五公里，属罗播区。从县城至郁林的公路，直从乡境穿过。乡境四周，土山环绕，中間一片肥沃的

稻田，常年有由山泉汇集的溪流灌溉，其中流量較大的有木根河、布新河、平合河三条（現这三条溪水都修建了水庫）。在这小山包圍的小平地間，聚居着都合、木根两个乡一千六百二十一戶居民（其中都合乡九百零七戶、木根乡七百一十四戶），人口六千七百零三人（其中都合乡三千七百三十三人，木根乡二千九百七十人），稻田四千八百七十亩（其中都合乡二千六百四十亩，木根乡二千二百三十亩），旱地不計算在內。

首先，我們調查了桂平都合乡一帶早期居民的族屬問題。

考桂平县境，在汉代为郁林郡布山、阿林二县地。南朝梁分置桂平郡。隋廢郡，于布山县地置桂平县。唐、宋两代，先后隶于燕、潯、貴等州。元代仍屬潯州。明、清两代屬潯州府。这些疆域沿革，早就見于載籍。但是，境內的土著居民究竟属于何族，前人記載，甚不一致。民国重修的《桂平县志》說：“遍考旧籍，邑中自元以前无僇人，明以前无僮人。”这就是說，僇族和僮族是分別在元、明两代才从別处移居桂平境內的；换言之，在元、明之前，境內只有汉族居民。这一說法是不可尽信的。据《南史，荀匠傳》載：“梁武帝天監元年（502），其兄（荀）斐为郁林太守，征‘僇賊’，为流矢所中，死于陣。”《南州異物志》載：“广州南有‘僇賊’，在蒼梧、郁林、合浦、宁浦、高梁五郡，地方数千里。”《隋书·周法尚傳》載：“开皇十七年（597），春，二月，桂州僇帅李光仕作乱，帝遣上桂国王世积、前桂州总管周法尚討之。光仕帅勁兵保白石洞。”《通鑑》注云：白石洞在潯州南六十里。

《桂平县志》进一步指明：白石洞即今之白石山。由此看来，僇人早就居住在今之桂平县境內，而两汉至唐宋时期的僇、僚、烏游等族称，又显然与僮族先民有着密切的关系。据此，僮族为都合一帶早期土著民族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因而道光年間袁湛修的《县志》

指出：“十罗九古之名，皆僮村也。其有自粤东、福建、江西迁来杂处于村中，谓之客籍，而土著者为僮人。”此說較為可靠。

从此次調查所得到的材料来看，也可作为僮族是本地土著民族的旁証。例如这里的都合、罗播、石伯額等地名，其“都”、“罗”、“伯額”等字，照汉语釋之，几无意义，只有用僮語解釋比較恰当。僮語的“都”，即汉语“峒”之意；僮語的“罗”（亦作“陆”或“六”），即汉语“山包圍着的田垌”之意；僮語的“伯”，即汉语“咀”，“額”即汉语的“蛇”，合“伯額”二字而譯之，即“蛇咀”之意。以詞序論，按僮語的規律，凡是修飾名詞的詞，都在名詞之后，換句話說，即定詞在中心詞之后。这个詞不說“蛇咀”而說“咀蛇”，不說“蛇咀石”而說“石咀蛇”，僮語的詞序正是如此。袁《志》所謂“十罗九古皆僮村也”，已道出桂平一些村名用字意义的秘密。此說值得重視。地名具有相当的穩定性。僮語地名，只能是僮族先住在这里留下來的，不可能是汉族先住在这里而用僮語的地名。至于羣众說“都合”这一名称是因从前匪乱，新村、文村、旧屋等村住戶較少，人力单薄，怕受劫掠，迫得都合并起来在一处居住，故名都合。这种說法，看来未免牽强附会。这里羣众所說的“匪乱”，大概是在他們祖輩的时间，也就是指百年左右的事。其实罗播区內的“上都”（包括新村、大路、玉屋、簡井等村）“中都”（包括沙坡、柴头、中央巷等村）、“下都”（包括細村、石岭、覃屋等村）等名称，早已有之。足見此說之不确。又如在現在都合一带居民的語言里，还留有不少帶僮語的詞汇，如称割禾为“棍（gon2）禾”，淋粪叫“漂（beu2）肥”，盖复的盖叫“拎（gom5）”，所有“gon2”，“beu2”，“gom5”都是僮語詞汇。其次，在許多詞汇的发音中，也有不少是与僮語一致的，例如田、平、蹄等詞，汉语发音有吐气，而僮音則不吐气。这

些，都与历史上民族文化交流相互影响有关。再就现在都合乡居民的姓氏考察，所有卢、玉、韦、覃、黄等姓，都是广西境内常见的僮族大姓。而住在都合附近数村的这几姓的居民，从现存木根中心校的一口明万历二年（1574）铸造的三界庙铁钟及清康熙十九年（1680）万寿寺铸钟塑佛碑上所载捐钱人姓名来看，都是比较多的。可见这几姓的居民在此定居至少已有四百年的历史。现在他们的子孙虽不说僮话，可能是与后来迁入此地的汉族，由于长期的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斗争而相互影响的结果。

从上述情况看来，僮族是早期居住在都合的民族，似乎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其次，我们对深塘冲两处阳纹石和王升冲阴纹石进行了比较深入和全面的观察、调查，收集一些民间口碑，纪录了现场实际情况，捶拓了阳纹石纹拓本，临摹了阴纹石图形，并拍摄了照片，凿取了约二立方市尺阳纹石块标本。随后还组织了两次小型座谈会，大家就这些石纹发表初步意见。兹将工作情况分述于次：

（一）在实地观察石纹之前，我们从群众中收集到如下的有关石纹的传说：

据七十二岁老人吴业乾（贫农、草药医师）说：相传老祖宗一辈已有人见到这些石纹，人们把它称为“番文”（即看不懂的外国文），或叫做“反手字”。大约在清朝乾隆年间，世道纷乱，匪盗横行，到处打家劫舍，掠夺民财。匪盗把抢劫到手的金银珠宝，因一时带不走面埋藏起来。这些石纹，便是刻下来标记窖藏的暗号。当时，这些匪盗还把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拉到窖藏附近杀死和埋在那里，用意在于使这少女的“鬼魂”看守窖藏，如果有人来挖窖，就会被“鬼魂”捉弄。因此，长久以来人们都不敢冒险去挖。后来，据说在清光绪末年和抗日战争前夕，曾有郁林人到此挖过，

而且还說他們帶了什么，“宝书”来，对照着书上所記的地点挖掘的。那书上記着：某月某日深夜某时，在石紋石上豎一条一丈长的竹竿，循着月光映出的竿影所指的方向，就是窖藏的所在。据說，这些人虽然来挖了，但結果一无所获。这一傳說，在当地流行很广，我們訪問过好些老人，所說大体相同。茲不贅录。

（二）石紋之現場紀錄：

我們此次看到了下面三处石紋：

第一是深塘冲石伯額阳紋石之一（图VI）。这块岩石位于都合乡东南一座名叫猫儿岭西北的深塘冲中段，距都合乡人委所在地約三华里。冲沟由东偏南作弯弓形向西偏北延伸。現時冲沟大部已干涸，只有几处还冒出涓涓的山泉。冲之两旁山脊，虽是土岭，但山沟两岸随处都露出淺紅褐色的水成岩。阳紋岩石附近的山坡上，种有荔枝十来株，沙梨数株，酸梅数株。冲底是蜿蜒曲折的樵牧小路，由冲口通向山頂。石紋在一块較為平整的岩石上，小路經過石旁。离此石約七米处，有沙梨一株，农民在树下堆砌了几块长方形岩石作为歇息之处。在阳紋石的下方約三米处，有小田一丘，田边堆砌与阳紋石同质的許多乱石。站在这些石上向西北瞭望，可以看到都合乡大村的屋舍。

阳紋石在冲沟右岸山脚下，由东北向南偏西20度，傾側角8—10度。岩石平面长2.5米，中闊1.2米，上端闊65厘米，下端呈不規則的半圓形。岩石平面上凸起許多不規則的石紋，有笔直的、弯曲的、交叉的、圓点形的各种条紋，高低不一，一般在一厘米左右，上半截凸紋較低，只有半厘米左右。线条的长短也参差不齐，或断或續，多数几条連在一起，少数单独在一处。条紋寬的約五厘米，窄的在二厘米左右。这块岩石与附近的岩石一样，都是沙质水成岩，石质內夹杂着大小不一的石粒。据我們初步檢查，凸起

的石紋与其它部分相較，紋理較密，質地較硬，不如凹下部分那么疏松或多夾着細小的砂礫和一些帶鐵質的石片。

在上述有紋岩石附近一米左右，有一塊多角形的石板靠在嶺脚下，石長1.8米，闊一米左右，厚30厘米，很象是从有紋石上崩脫下来，后来被人移到这里的。

第二是石伯額阳紋岩石之二。（图V）这块岩石，也有凸起的阳紋，位于同一冲沟上游，距离第一块阳紋石約15米的冲沟旁东面土嶺脚下，石面从嶺脚向冲沟方面傾斜。石長三米多，闊一米多，右側是一条小冲沟，現在沒有流水；左側是一条小路。这石部分露出地面，部分埋在土里。我們曾用鉄鏟掀开一些坭土，仍然可以見到一些类似露天部分那样的石紋，它的高低、寬窄、長短，都和第一石大致相似，石質則完全相同。

除上述两处阳紋岩石外，在同一冲沟里的小路旁及都合村的巷道中，我們还发现几处与此相似的石块，被人打碎作为迭砌沟岸之用。足見这种有紋岩石是不少的。

第三是王升冲阴紋岩石，即徐松石所指的“都合文化”内容之一（图II）：

这一阴紋岩石位于猫儿嶺东側，距离都合乡約八华里。由乡人委出发，向东行，过一田垌，循平合水庫而入，約一里，由左側上山，越过一小山山坳，再折向东行，經過二条小山脊，就到王升冲。冲的下段，有梯田数处；上段的山坡上，巨石聳立冲旁，这就是阴紋石的所在地。

山冲小溪由东北流向西南，巨石順着溪流方向面朝冲口。此石大体上呈长方形立体，左面的大部分和后面都埋在左側的土嶺斜坡里；右面接近冲沟。正面較平正，且大致垂直。前面地面开豁，石紋就出現在正面层面上，远远看去，很象一块豎在山坡上的大石

碑。呈現石紋的一面，高5.1米，底邊闊2.2米。石頂稍平而微斜，橫4.5米，縱6.7米。在約10平方米的正面上，滿布着密密麻麻的凹下石紋，長短寬狹、平直曲折都很不一致，共約一百一十多划較大而深的條紋。有的幾條彼此相連，有的只是單獨一划。凹紋一般深約7—18厘米，闊八厘米，一般長約20厘米，最長的有60厘米，最短的為15厘米。

石紋形狀既不象圖案，線條布局似乎也沒有規律，有交叉形、弧形、逗點形和橢圓形等。在大而深的石紋之間，還密布着許多手指粗細的凹紋，長短深淺不等。

這塊巨石是砂質岩石，有紋的石面間雜着許多大小不同的卵石和比較鬆散的砂礫，有些仍在不斷剝落中，我們會試用小刀和木棒剔撥，其鬆散部分就立刻脫落下來。近沖溝的一面，夾雜着的小卵石更多。

這些石紋，究竟是天然形成抑或是人工鐫刻的呢？到實地去調查、考察的同志都發表了自己的初步見解。為了便於分析研究，把過去的和現在的各種有關意見分別錄在下面：

1939年中華書局出版徐松石所著《粵江流域人民史》一書中斷定：這是人工的石刻，並對鐫刻時間也作了推斷，說是“惟刻造時必已使用鐵器……即最遲亦在秦朝時代。大約指他為周時的制作最為妥當”。其論據是：（1）在此石上面百余呎還有許多大石，又隔離一個坤子也有大石不少，但均沒有刻紋。（2）此石除頂面外，旁邊顯露的共有三面，但只在向外一面有這樣的刻画。（3）所刻點畫深自半吋至二吋，均系起止分明，絕對不是風雨日光所生的變化。（4）有整齊的交叉形和直角形。（5）此石質地甚堅，非借人工不能作成此種現象。（6）石高十六、七英呎，若非有意的人工制作，刻紋必不會發現於這樣高的地方。（見該書第二十三